

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次大断裂

上海 | 郝雨

今天我要提出一个一直被整个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忽略的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断裂实际上有三次。多年以来,以新儒学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在谈论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时候,经常谈到的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有两次断裂。“两次断裂”的说法大家都不陌生,比较公认和流行的观点就是,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断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儒家思想,打倒孔家店,反儒学,反传统;而第二次大断裂就是“文革”。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进程,就会发现,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第一次断裂,也就是真正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发生根本性断裂的,是发生在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个事件的间隔时间只有七八十年,显然“焚书坑儒”是一次对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罢黜百家”不仅仅是在学术上,在文人当中的一种学术争论,而且是通过政治手段,是一种人为的强制的力量,作为基本的国策来执行的。这种对百家文化的打击,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文化的断裂。我们必须把这一阶段真正地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地被颠覆,是这一时期。这是第一次。

如果按照“两次断裂”这样的说法,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倒孔家店,就是针对儒家。所以造成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断裂,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好,认定传统文化断裂也好,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误区,是把当年“罢黜百家”之后所形成的儒家唯一的独尊的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误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推翻了儒家独尊的这样一种思想传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为鲁迅提出来的把立人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思想,也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是错误的话,那么,又怎么解释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意义?如果我们把第一次断裂搞明白的话,我们就会知道真正中国文化最全面、最繁荣的内涵是在先秦,是在百家这个时期。到了汉代发生了断裂,由于

儒家独尊,就导致了两千多年一种思想来统治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思想上的单一就很容易导致僵化、衰落。所以新文化运动是针对这样一个现实提出反传统目标的。这里的反传统所反的这个“传统”,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而是“罢黜百家”之后,“独尊儒术”的专制主义文化。

今天我们发掘和传承传统文化,归根结底重在发扬诸子百家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新子学”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我们希望现代文化学者更多关注这一新的文化动向,积极参与“新子学”的讨论,打破学科森严壁垒,打通古今学术通道,现代文化研究不再言必称西方。让新媒体和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发展,在子学精神的全面助力之下,进入崭新时代,开创辉煌未来。

说说“新子学精神”

福建 | 谢清果

我认为“新子学”之“新”,在于从新的历史时期、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或理论来阐发诸子的修身思想。这里,我拟进一步阐述“新子学精神”。子学精神是由子学的基本思想构成。“新子学精神”是子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阐发、新观点、新创造,是在对子学精神“照着说”的同时,更强调“接着说”。那就是要说出时代新意蕴,说出普世价值观念,说出民族永不褪色的精神气质,说出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从而把“子学”恒常的精神价值透过接地气的方式方法融入时代主题,涵化时代意识,升华民族气质,展现对话能力与诉求,从而谱就中国思想界一曲曲“中国好声音”,书写中国理论界一篇篇“中国好文章”,讲出中国文艺界一个个有思想启迪的“中国好故事”,从而有力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新子学精神”在于能够回应“新时代”命题。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种新观念的提出必须能够积极回应时代的问题、历史的心声、未来的方向。“新子学精神”正是有力地回应了中华文化当前如何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自由、公正等国家提供熔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革新精神于一炉的新观念、新理论、新境界。正如克

罗齐所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的传统文化精神都具有当代性,这正是传统的魅力所在。而“新子学”所以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正因为其内在蕴藏着深刻隽永的“新子学精神”。

二、“新子学精神”在于能够蓄养“新民”。在新的历史时期,“新子学”所要造就的国民,是既能继承“百家争鸣”时期思想激荡、建功立业、游离权贵、富国强兵的子学精神,又能高扬富有时代气息的独立自主、个性张扬、理性论辩、造福人民的“新子学精神”的人民大众。

三、“新子学精神”在于能够缔造“新境界”。境界是人对自己精神高度、深度和广度的不懈期许,是时代精神的落实与体现,是人生成就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新子学”造就了“新子学境界”,这一个境界有儒家“铁肩担道义”的执着精神,有道家“天地任我行”的逍遥情怀,有法家“必轨于法”的秩序意识,有墨家“日夜不休”的践行意志,有农家“君臣并耕”的重农之教,有纵横家“通权达变”的谋略素养,有阴阳家“阴阳消息”的洞察自然与人间的取向,有杂家“兼收并蓄”的综合创新方法,有名家“控名指实”的求真务实原则,有小说家“街谈巷语”的民情描述,凡此种种。由此可见,诸子百家各有所长,诚乃“道术为天下裂”的结果,诸子各得其一察而自好,然而,殊途而同归,其归之要旨在于修身为本,治世为标。“新子学境界”就在于综合创新传统“子学精神”,铸就新时期的“新子学精神”。而这一个“新子学精神”正是融合了九流十家之所长于一体,形成了尊道贵德,重法爱民,尊重自然,求新求变,以我为主,融会贯通,谋定力行,生动活泼的“新境界”。

四、“新子学精神”在于能够呼应“互联网精神”。这是个新媒体的时代,任何学问的发扬都不能无视新媒体的存在。“新子学”也不例外。“新子学”的传播需要新媒体这一渠道,“新子学精神”的践行需要新媒体使用者的广泛参与。更关键的是“新子学精神”与新媒体时代互联互通的“互联网精神”是共通的。“平等、开放、协作、共享”是互联网精神之所在,而“新子学精神”正是高扬了诸子个性放达的平等意识,晋才楚用的开放胸怀,“不治而议”的奉献情怀,观点论辩的分享意识。

可见,“新子学精神”体现出在新媒体时代高扬

传承与创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子学精神的一种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它既回应了中国社会阔步前进的精神需求与价值追寻,又回响着“民为邦本”的历史叮咛和“其命维新”的责任意识。更重要的是,在“新子学精神”的感召下,开拓出对己秉持“闻道勤行”的意志与对外则奉行“美美与共”原则的“新子学境界”。

从子学精神谈“新子学”意义

河北 | 李振纲

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中曾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六百年间的历史,称为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在这段时间中,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中国文化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样的轴心时代。当时社会结构的动荡改组,典章制度的新旧更迭,王权式微、诸侯导致的政治格局,营造了思想史上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人文奇观。

那时思想家头脑中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独尊的权威,“天下之人各为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孔丘、墨翟、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荀卿、韩非等一大批思想巨子,以其不拘一格、独抒己见的原创型思想,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国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确定;以注重对认识对象的直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辩证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建构;重人伦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文化价值原则在这一时期提出,人道与天道参赞化育、和合生成的世界观在这一时期定型。

诸子学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思想的原创性和多样性。儒家站在人生之内逆觉体证宇宙万物之生命本源,并据此体证追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审视人生的意义、命运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